古史传说是我们民族的史诗

许永杰

1989年，吉林大学中国北方考古研究室动议编著一本《公元前三千纪的史前中国》论文集，收入张忠培先生和他的弟子有关龙山时代的考古学论文。我提议要增写一篇关于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整合研究的论文，陈雍先生说，既然你提议就由你来写好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论文集搁浅了。我之所以有增加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文章的提议，是因为在随张忠培先生攻读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生期间，曾反复阅读徐旭生先生的名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徐先生的著作是从文献史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史传说的集大成之作，书中提出的炎黄、东夷、苗蛮三大民族集团的划分为学界普遍认同。1994年出版的苏秉琦主编，张忠培、严文明撰写的《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实现了考古人运用考古资料独立书写历史的愿望。但是苏秉琦先生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中却说：“已出版的中国通史的史前部分，虽大都企求在理论指导下运用考古材料和古史传说，但限于目前的研究水平，理论与材料、考古材料与古史传说之间，难免缺乏系统的、有机的结合，尚未形成中国史前史的科学体系。”

我的硕士和博士学习是师从张忠培先生攻读中国汉代以前考古学及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张忠培先生是苏秉琦先生的副博士研究生，师伯俞伟超先生讲苏秉琦先生是把徐旭生先生视作导师的。因此，我的《中国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是意图承继师门的学术，推进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的整合研究。

业师张忠培先生认为，撰写一部学术专著，需要有两三篇研究文章作为基础。《中国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有三篇基础文章，分别是《再审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年代关系》《庙底沟文化与天鼋》《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整合研究的两个瓶颈》。1982年春，我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被分配到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岳邦湖馆长安排我进大地湾项目组做发掘和研究工作。秦安大地湾遗址有着大量的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遗存，我认真地摸过两个文化的陶片，还亲手挖出过一件器表绘制天鼋图案的庙底沟文化葫芦口彩陶瓶。自20世纪60年代初学界提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便有了两者年代关系的争论，直至80年代初张忠培先生和严文明先生主张的半坡早于庙底沟的观点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拙文《再审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年代关系》抛弃使用遗址分期作为证据，也不使用地层堆积叠压关系和包含物作为证据说明两者年代关系的做法，而是使用刻度更为精细准确的灰坑、房址、墓葬等遗迹堆积单位的叠压打破关系和两文化的文化因素共存作为论证依据，得出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是年代同时的两支考古学文化遗存的认识。自信这篇文章是争论数十年的这一学案的终结。

以往学界研究庙底沟文化的彩陶，大多关注鸟纹图案和花卉纹图案。《庙底沟文化与天鼋》一文，将彩陶的研究聚焦到“蛙纹”上。庙底沟文化的蛙类图案实际上是天鼋，殷周青铜器上有大量的天鼋图形文字，郭沫若认为天鼋即轩辕，轩辕氏是黄帝诸名号中出现最多的一个，轩辕即黄帝，庙底沟文化就是黄帝部族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既然庙底沟文化是黄帝部族的物质文化，那么在分布地域上与其交错、年代上与其平行、文化面貌上与其相类的半坡文化，自然就是炎帝部族的物质文化。同理，在分布地域上位于其东侧、在年代上与其平行、在文化面貌上与其有别的后冈一期文化自然就是蚩尤部族的物质文化。

将五帝时代早期的炎帝部族、黄帝部族和蚩尤部族的活动年代认定为仰韶时代，那么五帝时代晚期的唐尧部族、虞舜部族的活动年代就落在了龙山时代。于是就有了本书的后冈二期文化与共工部族、尉迟寺类型与虞舜部族的整合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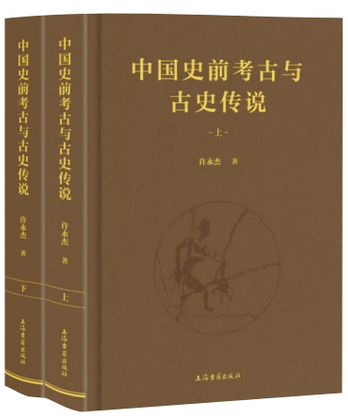
2013年，我应邀在逢甲大学做一学期的讲学，其间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台湾有关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上古史（待定稿）》和《中国上古史论文选集》等。是年5月，在江苏张家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成果汇报会”上，作了“传说时代文献整理问题”的发言，后来写成《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整合研究的两个瓶颈》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表述了关于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整合研究的理念——三个可能、一个不必：从考古学文化的格局考察古代部族的战争与融合是可能的；从考古学文化的迁徙考察古代部族的迁徙是可能的；从考古学文化谱系考察古代帝王的系谱或古部族的族系是可能的；不必将传世文献中的圣王贤臣的发明与考古发现一一挂钩，史前时期物事的出现应以考古发现为准。本书写作内容的布局就是依此理念而建构的，第二编《从考古学文化的格局考察古代部族的战争与融合》是三个可能之一，第三编《从考古学文化的移动考察古代部族的迁徙》是三个可能之二，第四编《考古发现与古帝王发明》是一个不必。至于三个可能之三，原本计划写作夏部族、商部族、周部族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和部族系谱，考虑本书的体量和时间下限而放弃，而将旧作《周文化形成与周人兴起的考古学考察》作为附录收入。

做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整合研究有一个考古学文化族属认定上的理论问题，即一支考古学文化遗存可不可以为多个人群集团共同创造和拥有？一个人群集团可不可以同时创造和拥有几支考古学文化遗存？遗憾的是提出这种理论假设的人，却没能举出实例。由于这个理论上的疑问，使得一些人怀疑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可信性，也使得一些人面对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裹足不前。拙文《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考察》曾阐述过我的研究理念：“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应建筑在谱系研究的基础上。首先通过谱系研究确定考古遗存的系谱，然后将文献记载的古代民族系谱进行梳理，最后将两支系谱类比并得出结论。”本书原计划写作的夏部族和商部族物质遗存的考察，以及早年发表的《周文化形成与周人兴起的考古学考察》《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考察》就是用这样的方法研究和写作的。我相信基于考古学材料的研究，用考古遗存说话，是可以进行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族属研究的。本书的研究表明，理论上的一支考古学文化遗存与多个人群相联系，一个人群与多支考古学文化遗存相联系，确实是可以成立的。共工部族同时拥有分布在豫北冀南的后冈二期文化和分布在豫西晋南的三里桥文化两支考古学文化遗存，分布在燕山两侧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同时为活动在滹沱河拒马河水系与壶流河水系的有易氏和活动在西辽河水系与海河水系的孤竹国所拥有。

本书名之为《中国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涉嫌过大，我深知中国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内容浩繁，绝不止区区本书所涉猎的这些。想做或应该做的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整合研究的内容太多了，但是就目前积累的考古学材料而言，想要得出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还不成熟。一些重大的问题甚至都没有能令我本人满意的想法，诸如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是哪一古代部族的创造，陕北高原的神木石峁山城的主人是谁，《五帝本纪》中的颛顼部族、帝喾部族又该与何种考古学文化遗存相联系等等。

本书的研究材料主要是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但是两者是不对等的。考古材料要多于文献材料，考古学不断有新的发现，材料的积累速度非常之快；汉代以前的传世文献材料有限，每一篇，甚至每一段、每一字，前辈学者都有非常精准的考释，近年虽然有很多出土文献面世，但是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那样与本书研究相关的文献并不多。所以本书的写作内容，考古方面明显多于传说方面。关于这一点，我在写作《周文化形成与周人兴起的考古学考察》时就深有体会，原本想写成周文化形成和周人兴起上、下两篇，后来感到如此布局的结果是畸重畸轻，便写成了五个部分，前四部分是考古材料的周文化，后一部分是文献材料的周人。

（本文为《中国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书前絮语，题目为编者拟）



《中国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全二册）
作者：许永杰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9月

钱币研究视野下的文化认同

魏坚 周卿



王永生先生的三卷本“泉铸华章三部曲”由光明日报出版社于2026年3月出版，在古代钱币研究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实在话说，凡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专业人员，几乎都在考古发掘中有过发现不同时期各类钱币的经历，并在考古报告中有过一些必要的介绍和相关论述，但对钱币做专门研究的考古学者却相对较少。所以，当我们捧阅这部三卷本的著作之余，钦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于是便不得不就这部书的出版，谈谈看法。

钱币属于古代历史文物范畴，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实物见证之一。但是，除了考古学者偶尔会用出土的钱币作为考古遗存的年代旁证之外，一般不会对钱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大多历史研究者也并不太关注钱币。多年来，有关钱币的书籍虽然出版了不少，但是大多都属于钱谱、图录之类，而且多停留在钱币形态的描述、分类及鉴赏层面，很少有人从社会制度和人文思想层面做深入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钱币作为反映和记录历史最客观、系统的实物资料之一，是能从点、线、面三个维度呈现上至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等宏大叙事，下至普通百姓的市井生活，并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关系密切的物质载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但是至今仍没有引起主流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更谈不上系统地研究和阐释了，致使如此重要的一块学术“富矿”，依然还停留在传统的个人收藏、把玩鉴赏、甄别版式、编撰图谱的小众层面，而没有进入主流学术研究的视野。

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一般的历史研究者多注重历史文献资料，很少利用实物遗存；即便是考古学者也很难系统地接触到钱币实物；而博物馆保管钱币以及民间收藏钱币的个人，虽然能接触到钱币实物，但是因为对有关钱币的历史和文献的不熟悉，只能从保管的需要给钱币登记造册、归类建档，或者是从鉴赏的角度进行版式区分、编印图谱，而做不到在此基础上开展学术研究。此外，如果对钱币实物没有多年的接触和摸索，连基本的真假辨识都做不到，更遑论研究了。因此，只有将有关钱币的文献资料和钱币实物结合起来，钱币研究的学术价值才能被挖掘出来。

“泉铸华章三部曲”就是将上述二者完美结合的典范。这当然与作者的成长环境、求学经历以及工作履历是分不开的。

作者出生于新疆伊犁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的乡村，自幼与维吾尔族为邻，从小就学会了维吾尔语，后来考入新疆大学历史系学习时，又自学了维吾尔文字。幸运的是，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金融研究所专职从事新疆钱币研究工作。作为恢复高考后历史专业科班出身，他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大学时就在《新疆大学学报》发表专业论文并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中心”全文转载。因为熟悉维吾尔文字，又能接触到大量的钱币实物，所以具备了研究新疆及中亚地区钱币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这些优势很快就在作者的准噶尔普尔钱、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高昌吉利钱币，以及清代新疆红钱等专题研究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在他参与编写的《新疆钱币》出版后，引起了中国钱币学会的重视，随后被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与筹建中国钱币博物馆的工作，从此进入了中国钱币研究的学术殿堂。在他主要负责学会秘书处繁忙的日常行政工作之余，对学术的兴趣丝毫未减，在发表近百篇论文的基础上，又先后撰写了《新疆历史货币》、《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中国货币史话”系列丛书、《三千年来谁铸币》、《钱币上的中国史》五部学术专著。“泉铸华章三部曲”这部三卷本的专著，就是在其早期钱币研究的基础上参考诸多学术成果着力完成的。

通览全书，可以感受到这套书稿的写作思路与论述视角，既与一般钱谱、图录类的钱币书籍不同，也与作者此前以考证铭文、论证背景、讲述钱币背后故事为主要内容的五部专著有别，是在以往“点”（单枚钱币考证）与“线”（专题论述）研究的基础上，从更为广阔的“面”的视角作了进一步的分别阐释：钱币是如何见证中央王朝在新疆地区的治理及文化认同的；钱币是如何记录历史上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的；钱币是如何讲述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间货币文化交流及影响的。

综观全书，“泉铸华章三部曲”有如下三大特点：

视角独特。通过钱币这一小的切口论述宏大的理论叙事，寓抽象于具体，产生了有形有感的效果。三卷本书稿论述的主题分别是：边疆治理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中外文化交流，都属于理论性很强的讨论，一般情况下很容易陷入抽象的理论叙述。但是作者独辟蹊径，从钱币的视角展开，既有具体的钱币实物及文献资料做依据，又有扎实的考证和研究做基础，通过钱币这一实物见证，很自然地将抽象、宏大的理论叙事，用直观形象的钱币实物，有形有感有效地呈现给读者，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更容易被社会大众理解和接受，可谓是讲者有料、听者有趣。

视野开阔。通过钱币论证了中原腹地与边疆地区的融合，以及与周边国家和地区间的交流互动。钱币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还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文化认同的标志以及政治交往、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的载体。因此，作者通过钱币给大家呈现了一幅历史上从中原到边疆、再从边疆到周边国家及地区间相互融合、互动的历史画卷。读者从中可以看到的场景：一是历代中原王朝的钱币在新疆各地几乎都有考古发现，而且数量巨大，分布广泛，不但满足了流通需要，对当地的铸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见证了历史上的边疆治理与文化认同；二是一部中国钱币史就是一部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录和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演变进程；三是中国古代钱币制度对周边国家及地区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共同构成了区别于西方的东方钱币文化体系。

史论结合。通过图文并茂地讲述钱币背后的故事，兼顾了学术性、专业性与通俗化、大众化的结合。钱币不同于一般的文物，是社会产生重大变革或发生重要事件的产物，它的铸造既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又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人物及过程。不但有文献依据，还有具象呈现，每一种钱币几乎都在继承原有钱币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既有历史的延续性又有鲜明的时代性。因此，钱币具备讲好故事的必备元素。作者充分发挥了钱币的上述特点，很多重要的论证都是通过具体的钱币故事表述的。例如第一卷中，在论述了新疆地区钱币流通使用的历史后，又通过20枚钱币背后的故事，印证了书中有关边疆治理与文化认同的论述。第二卷中，通过元英宗铸造四体文“至元通宝”钱，宣传其“天下一家”政治理念的故事，揭示了元代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中“多元一体”的特点。第三卷中，通过日本战国时期的重要人物织田信长，将明朝的永乐通宝钱画在其军旗上的故事，反映了迟至明代，中国钱币文化对日本社会还保持着重要影响。通过钱币背后不胜枚举的故事，既印证了作者的学术观点，又增加了可读性。

“泉铸华章三部曲”的顺利完成，一方面利用了疫情三年大部分时间居家办公的便利，另一方面得益于作者常年的研究积累。若要对这部著作能够完成做一个总结的话，还应该与作者坚持做到的三个结合有重要关系。

一是货币理论与钱币实物的结合。货币的发明与使用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次重大的跨越，从此人类财物的转移在野蛮的丛林法则之外，产生了一种自愿让渡的文明方式。货币除了便利民众日常交易之外，还成为政府进行国家治理、社会管控的重要手段。因此，研究钱币一定要有货币理论基础及文献史料依据，同时还要对应具体的钱币实物，作者的专业背景和工作环境实现了两者的结合。

二是中原与边疆的结合。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原的农耕文明与边疆地区的游牧、狩猎文明共同创造了伟大灿烂的中华文明。但是，长久以来受历史研究的局限以及发展的不平衡，边疆地区研究经常被忽视。作者因其生长的环境和求学经历，对此有深刻的体会，因此在钱币研究上，很好地做到了边疆与中原钱币研究的完美结合。

三是官方与民间的结合。钱币研究是建立在掌握实物资料基础上的实证研究，但大部分的研究者只能从公开报道的书刊中获取资料，其实这仅是一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在民间。因为钱币是最有群众基础的收藏品之一，所以在钱币的收藏、鉴定方面，民间既有很多高手，也有很多珍稀钱币实物。作者多年在中国钱币学会秘书处工作，与各地的会员联系广泛，因此在研究钱币时，除了中国钱币博物馆收藏的钱币实物之外，还能从各地会员那里获得各种钱币资源，在资料的来源上，做到了官方和民间的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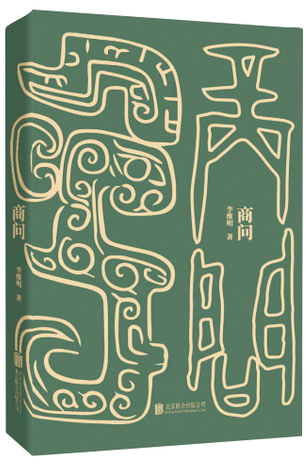
得益于此，这部三卷本的钱币专著才得以面世。希望借此能够引起考古文博界和钱币学界对这项多年努力重要成果的关注。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中蒙俄发展研究院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天圆地方铸一统：新疆出土钱币见证的边疆治理与文化认同》
《“圆形方孔”与“多元一体”：钱币记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泉流四海著华章：中国古代钱币文化对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影响》
作者：王永生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3月

《商问》：跨越两千余载的求索

贺俊



商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夏王朝之后的第二个王朝。由于年代久远、流传下来的史料有限，所以到了东周时期，时人对殷商史的很多问题已经无法给予准确回答。春秋时期的孔子就感叹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到了战国，楚人屈原在被放逐的过程中留下了千古奇诗《天问》，其中部分内容便是他针对殷商史的发问。在此之后，虽有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记载了殷商史中的若干重大历史，但古代学者对商王朝的认识实际上始终如雾里看花，难见其真容。

20世纪初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关键阶段，而其中最重要的推力之一便是一系列新史料的突破性发现。对殷商史的研究而言，这一时期新史料的发现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一是1899年发现的甲骨文，促使甲骨学成为一门全新的学问，为深化认识殷商史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科学考古的兴起，特别是1928年至1937年间对安阳殷墟遗址的15次发掘及取得的重大收获，刷新了人们对殷商社会的认识。

基于上述，学界对殷商史的研究开始进入到一个广阔的天地。百余年来，数代学人在殷商史这片沃土上持续耕耘，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不过，殷商史研究向以难治著称，不仅要求研究者具备考古学、文献学、文字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知识，还需要面对数量繁多的前人研究成果。因此，无论是从推动殷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还是出于对培养从事殷商史研究的专门人才考虑，抑或是为了满足社会公众希望深入了解殷商史的需求，目前学界和社会都急需一本好看且好用的殷商史著作。李维明先生的新著《商问》，恰好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

《商问》全书共计25万余字，除“前言”“后记”外，该书主要涉及殷商史领域中16个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大致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是依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来考察殷商史，主要涉及“商”字的字形字义、“殷”与“商”的关系、“玄鸟生商”的传说、商族的起源与迁徙、商先公和商王的传说与事迹、商王朝的年代等问题。二是从考古学层面全面梳理了学界对“商文化”和“先商文化”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向读者系统展示了商王朝的物质文化与社会面貌。值得注意的是，李先生在对每部分进行分析时，对前人的研究成果都作了“穷尽式”梳理，按照时代早晚尽可能收录不同的学术观点，善用量化统计分析，从而扼要地向读者传递出大量信息。可以说，全面性、系统性、简明性构成了《商问》一书的重要特色。

关于《商问》一书的定位与目的，李先生在后记中写道：“如果能将数十年读书笔记相关材料分类梳理出大致的学术史脉络，为学者提供一些参考信息，这一学术劳动的付出还是值得的。”确实，读罢该书，我们对殷商史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会有一个十分清晰的认识，但该书并不是简单地进行学术史的爬梳。在对相关问题进行回顾时，李先生往往会给出自己的判断，其间蕴含了大量真知灼见。比如，李先生将学界对“商”字字义的认识归纳为三类：一是与“鸟崇拜”“祭祀祖先”等精神活动有关；二是与“穴居”“丘居”等居住形式有关；三是与“耒耜”“陶鬹”“刻漏器”“酒具”“乐器”等器物的形态有关。在对卜辞“商”字进行分类的基础上，作者强调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类“商”字与鬲、斝等器形相近，认为“商”字的字形可能与商文化器类中具有文化性质代表意义的器类（如鬲、甗和斝）的部分造型有关。这一认识审慎有据，令人信服。再如，在对“商族起源”问题的分析中，作者从文献和考古等多方面证据出发，对商族起源的“东方说”“西方说”“北方说”“南方说”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简要讨论，强调“豫北冀南说”是比较合理的认识。当然，这一认识也是当前的主流认识，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李先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探究。例如，关于“盘庚迁殷之前可否称商”，李先生认为由于“迄今尚未见（或未释出）商代早期‘商’字出土材料”，因此这一问题仍然是需要学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治学态度，值得每位学人学习。

除学术观点之外，《商问》一书体现出的治学方法和理念也颇具特色。众所周知，上古史研究离不开不同学科的深度合作。对于我国早期历史的研究而言，如何认识文献史学和考古学的关系，以及如何利用它们开展整合研究，在学界向来有不同认识。《商问》虽然用大量篇幅从文献史学的角度对殷商史进行梳理分析，但作者对文献的记载并不盲从。一方面，作者注重从历时性的角度对文献进行梳理，认真考察某一故事或传说的演变，进而窥探历史之“素地”。比如，“玄鸟生商”是一个古老而神奇的传说。作者提出，“商代甲骨文、金文中丰富的鸟类记录显示，商族与鸟有着密切的关系，存在以玄鸟为族徽的古族。周代文献以此为素材，添加一些具体情节，创造出玄鸟生商的神话。汉代文献则分化出帝喾之妃简狄吞食玄鸟卵生商始祖契的故事”。显然，这颇具“疑古之风”，契合顾颉刚所提出的中国古史的“层累说”。另一方面，文献虽然可以为探讨古史提供依据，但李先生对相关材料的准确性保持谨慎的态度。例如，作者虽用较大篇幅回顾了文献中关于商王朝积年的不同说法且梳理了商王在位的年数，但作者最后强调，“据文献记载商周之年推算商年很难做到精确无误，所以历代学者推测只是根据史书记载史事对王年做出的判断，只能作为参考，不能视为绝对准确”。这一认识无疑是合理的。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作者深知仅仅依靠文献无法重建一个真实可靠的殷商史。由此，《商问》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利用考古材料去探讨殷商史，从而为读者展示出一个丰满的殷商社会。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商问》也存在一些缺憾或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一方面，考古学是一门重视“图”的学问，如果该书能够在相应位置增添部分插图，无疑会使其锦上添花。另一方面，某些学术问题还可作进一步的分析。如对先商社会形态的分析，似可在分期的基础上进行；下七垣文化年代的上限能否早至二里头文化一期，尚需更多证据；关于二里岗文化年代上限的问题也需要综合考虑近年来年代学研究的新进展。不过，瑕不掩瑜，《商问》当为近年来殷商史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好看且好用，对推动殷商史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最后想说的是，从《天问》到《商问》，这是一场跨越了两千余载的不懈求索。虽然时空发生了转变，但古今学人对历史的追问从未停歇。李先生在后记中说道：“学术需要传承，学术希望在后来学者身上。”包括笔者在内的后辈学人，当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自勉，以不愧于前辈学人的殷殷期待。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商问》
作者：李维明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26年4月